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 的文化价值建构

——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研究样本

Confucian Cultur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 Novels of
Cultural Values in New Period : Based on the Research Sample
of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ntries

孙俊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 的文化价值建构

——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研究样本

Confucian Cultur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 Novels of
Cultural Values in New Period ; Based on the Research Sample
of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winning Entries

孙俊杰 著

责任编辑:余 平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化价值建构: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为研究样本/孙俊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7443-3

I. ①儒… II. ①孙… III. ①儒家-传统文化-影响-长篇小说-小说创作-
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B222.05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911 号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化价值建构

RUJIA WENHUA CHUANTONG YU XINSHIQI CHANGPIAN XIAOSHUO DE
WENHUA JIAZHI JIANGOU

——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研究样本

孙俊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53 千字

ISBN 978-7-01-017443-3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儒家文化的当代际遇	1
第二节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	8
一 儒家文化传统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影响——从作家和 读者方面来看	8
二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小说的研究概说	16
第三节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与茅盾文学奖	20
第一章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基	24
第一节 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寻根表现	24
第二节 儒家文化核心精神“仁义”在作品中的表现	31
第二章 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	37
第一节 改革小说对儒家文化传统的表现与思考——从《沉重的 翅膀》到《英雄时代》	38
第二节 乡村小说中儒家文化传统的困惑与流连——《白鹿原》 和《秦腔》的文化选择	44
一 《白鹿原》和《秦腔》的文化选择	46
二 一个悖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纠缠	54
三 乡村的承载	57
第三节 传统文化如何讲述自己——《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 意识	61
第三章 弘扬民族魂——儒家文化精髓的“返本开新”	72
第一节 儒家文化精髓在人物身上的体现	72
第二节 士与知识分子	78
第三节 历史、文化、道德中的“士”——论《张居正》中的张居 正兼及《白门柳》中的士人形象	83

第四节	一腔浩气吁苍穹——宗璞《东藏记》的知识分子立场与书写	96
第五节	背叛与回归——《你在高原》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寻根之旅	108
	一 张炜小说创作的文化立场	108
	二 《你在高原》对民族精神的寻根	110
第四章	女性文本对传统儒家伦理的颠覆	123
第一节	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125
第二节	《无字》与《长恨歌》中的伦理意识	131
	一 《无字》:女性的成长史	132
	二 《长恨歌》:女性欲望的书写	138
	三 对传统伦理表现的内在矛盾	143
第五章	叙事模式中的“固有血脉”和“世界思潮”	146
第一节	叙事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	146
第二节	当代小说中的时间意识	157
	一 《钟鼓楼》的现代时间意识	159
	二 “多年以后”:现代时间意识的多样化	165
第三节	结构艺术的影响与创新	172
	一 书信体、纪传体、戏剧的多文本结构——《蛙》的叙事结构与主题	177
	二 反“目的性”的叙述——《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结构	191
第四节	“魔幻”:借鉴与本土化	199
结 语		210
附录一		215
附录二		218
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24

绪 论

第一节 儒家文化的当代际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成分、多层次的繁复体系,如“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直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①其中,儒家文化因自汉代开始与封建政权相结合,占据着犹如国教的地位,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它本身也融合了释家、道家、兵家等合理因子,由此,传统文化有时也代指为儒家文化,虽然并不确切。我们看取儒家文化传统的当代际遇,离不开其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巨大挑战,及其被迫的发展和转化的过程。

儒家文化传统在历史中是一个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各代有各代的儒家。有原创性的先秦儒家,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汉代儒家,有融化了禅佛思想的宋代儒家,有集大成的清代儒家,还有在民国后与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新儒家’。各代儒家思想都有变化和发展。”^②它并非是一个死的“流”,而是一个活的“源”。在漫长的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这种变化与发展,不外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儒家文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作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时代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化。另一方面是来自别种文化的冲击和威胁。如禅、佛、法、兵以及西方文化,这些犹如异质的因素对儒家文化构成一种对抗瓦解的力量,也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儒家文化自身的脆弱、僵化与固守之处,驱使它吸收融化其他文化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以更好地行使其整合人心和社会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但无论如何变化,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核心肌理都是共同的。它以“仁”学为其本质和灵魂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天人合一”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三纲五常、家庭本位、忠孝观念来关照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仁、义、礼、智、信等作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一般

① 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社 1960 年版,第 49 页。

②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行为准则,以三纲领八条目^①为人树立了道德理想的典范目标。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凭借其依附的坚船利炮显示出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势、更加优势的姿态,先进的中国士人则力图在儒学框架内吸纳新质,重铸新声,重塑孔子形象^②,以挽救颓败的国势,但终未能挽狂澜于既倒。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统治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儒家文化又失去了政权的支撑,国力衰败被欺凌的弱势地位却未得到改善,而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也开始思索中国老大落后的内在原因。诚如鲁迅所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③而觉悟的智识者将这种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思想文化方面,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中,科学与民主成为启蒙者的主要任务,对应着传统文化造成的人的愚昧和专制。“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发出反传统的呼声,以绝无仅有的彻底精神涤荡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必”字句可说是“五四”的典型句式,^④西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被置入革命/反动、前进/倒退、科学/愚昧、自由/专制、现代/传统、活/死、新/旧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甚至主张文化上“全盘西化”在精英知识分子中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虽然有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对传统文化不无更加理性、对西方文化也保持更加清醒的看法,显示了“反思现代性”的倾向,但长期以来,他们都是作为封建文化、作为“五四”革命的对抗力量而受到批判,即使在我们当代所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亦不

① 《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程颐认为“亲,当作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在他所著的《大学章句》中,把《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人称之为“三纲领八条目”。

② 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西学为参照系统,托古改制,重塑孔子形象。

③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④ 如汪叔潜在《新旧问题》中所言:“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蠹贼。”(《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李大钊:“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陈独秀1917年5月1日答胡适之关于文学革命的信尤多被人引用:“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之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载《新青年》3卷3号)显示着某种与传统文化决绝的社会情绪,也反映了五四新文化人物的某些偏激之处。

乏这种观点。^① 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里,文化间的冲突,往往并不局限于纯文化的性质,而显现着更为深层的政治背景。这些文化上的论争,也必然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吃人”是那个时代给予传统文化最为形象的画像。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救亡压倒启蒙”,在此一时期,传统文化在事实上成为我们国家认同、团结一致的精神凝聚力。舍生取义的儒家道德伦理也内化为保家卫国的革命实践,“精忠报国”“孝悌”之义转化为爱国、团队精神。在文学创作中,有了老舍写作大鼓词,创作《四世同堂》,挖掘民族的精神优质,也正视民族的精神负累。解放区的文学创作难见个性解放的提倡,代之以家庭在适应新的革命需要基础上的和谐与稳定,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②,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③。依许纪霖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历史的概括,“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失败,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互相调和的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三十年代前叶,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互相批判的时期,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到新中国成立,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时期”。^④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直到“文革”期间,传统文化再次作为被彻底打倒彻底清除的对象被涂鸦成封建妖孽谬种。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一次被推到了文化争鸣的风口浪尖,在“新启蒙”的社会任务和“现代”的坐标中,被批判、反思、再认识、再评价。“文化热”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它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降温,

① 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称以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为“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将“学衡派”认为是“封建复古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而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将“学衡派”评为“思想倾向稳健保守”,“击中了新文学倡导者的弱点和某些要害”,已不再将之与封建相挂钩,这些评价的差异无疑显示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对待文化传统态度上的某种转变。

②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影响下,由鲁迅等人于1936年6月提出的。鲁迅指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见《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

③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④ 许纪霖:《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历史评述》,《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4期。

然而文化研究和各种讨论却并未间断过。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学人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探究文化和文化史的种种问题,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国学热”。这种“文化热”和“国学热”作为 20 世纪后 20 年中的客观文化现象,表现于这样几个方面:数量众多、规模不一的文化问题座谈会和研讨会的举办;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大量文化研究专栏的开辟和各种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①

很多学者研究概括这种“文化热”兴起的原因,认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文化论争的继续和发展。从根本上说,这种论争都是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关系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展开,无论是近代的“中体西用论”,还是“五四”的“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它们代表的是从近代到“五四”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并没有背离这些论争的主题,可以说这次“文化热”是近代和“五四”文化论争的历史的延伸和历史的再现。再次,“文化热”及“国学热”出现的深层社会根源在于,它是人们对“文革”进行

① 1982 年 12 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对文化与文明、文化史的对象与范围、文化形态诸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估计、中外文化的交流、文化中心、文化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紧迫性。之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迅速地在各地展开。1984 年 12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了全国首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就东西方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特点、差异以及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海还影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共 50 种。在官方的支持和赞许下,1984 年山东曲阜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孔子研究》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孔子研究讨论会,考察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间的联系。1985 年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孔子研究院,这两个机构也成为中国孔子研究的两大中心。1985 年,“中国文化书院”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发起成立。受海外新儒家影响,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现代性发展的动力,由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和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主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于 1985 年 3 月 4 日开学,历时 20 天,于 3 月 24 日结束。参加这次讲习班的授课导师是: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侯仁之、任继愈、金克木、虞愚、牙含章、石峻、吴晓铃、袁晓园、戴逸、何兹全、丁守和、阴法鲁、朱伯崑、汤一介、白化文、庞朴、杜维明、陈鼓应、李泽厚、孙长江和鲁军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170 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特质和要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的传统经学和宗教、汉字的发展,中国的古典文学、音乐和书法艺术,中国的传统地理学,等等。1986 年 1 月,这两个单位又联合举办了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1985 年 12 月 19 日至 30 日,武汉大学哲学系邀请了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在古城黄州举办了一次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为题的系列讲座。举办讲座的宗旨,是探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系。传统文化研究机构除中国文化书院,还有诸如:中国文化研究所、汉唐文化研究室、国学研究所、文史研究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等等。出版丛书如《文化哲学丛书》《人文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

理性反思的结果。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向思想文化提出了客观的要求。^①这几方面都属于我们自身内部的原因,除此之外,有论者也指出了来自国外大环境的影响,认为西方出现的“中国热”也促使中国自身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②

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主要关注儒家文化传统与两方面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上,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和 90 年代的国学热衷的焦点,其他一切文化与文化史问题的讨论都是以这一问题为中轴而展开的。”^③因为现代化是中国自晚清、“五四”以来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改革开放伊始,更是明确地将工业经济的发展、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目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论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如刘晓波认为二者根本冲突,不可调和;^④而更多的论者则以辩证的观点,认为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只是具有冲突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相契合的一面,由此主张在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消极落后因素的同时,挖掘、弘扬其对实现现代化有意义的层面。^⑤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再持有绝对的“愤传统”的观点,这种绝对的“愤传统”除了提高点击率,激起虚无主义的民族情绪之外,无论于现代化建设还是文化传统的反思都无益处。“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

①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② 郑晓江的《中国文化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和前景》(《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认为这种热潮的背景和原因在于: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发生了猛烈的碰撞。二是在西方出现了“中国热”;李晓东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4 期)认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国外的研究的兴盛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对文化史的研究,当然是缘于对文化的研究。

③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62 页。

④ 如刘晓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它扼杀人的创造性,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见其所著《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及《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 年第 10 期)。

⑤ 这一方面的论述很多。如严钟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暨南学报》1987 年第 4 期);魏承思:《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社会科学》(沪)1987 年第 10 期);李侃:《门外私谈》(《东岳论丛》1988 年第 4 期);汤一介:《中国文化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 年第 3 期);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江汉论坛》1988 年第 2 期);等等。

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①可说是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必然是双向的。它一方面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或改造其中的消极层面,发掘并弘扬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②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即写作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以戏说的方式论说了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学说的共同之处。^③郭沫若尊孔,认为孔子的思想属于“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意识形态,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两种势力最大、影响最深广的理论学说,它们的相互结合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很多论者对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对它们之间的相通相容及相异相别进行了论说。如邵汉明将它们之间的相通性归结为四个方面:人本性、理想性、实践性、整体性。^④刘小枫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儒教精神根源,“没有现代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不会出现;没有儒教文化传统,也不会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⑤而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和谐发展”的纲领也无不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理论资源。

深入考察“文化热”“国学热”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说,可以看到它是源于知识分子心理上的两种焦虑:一种是现代化的焦虑。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相比,自身落后的状况和危机,我们需要奋起直追,需要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西方文化以及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映照出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端。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我们听到了来自极端民族虚无主义的声音,^⑥就如同“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时空回声。当然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不可能占据文化的主流,即使是“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更多的也是对传统文化优

① 张智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张念丰、张秉楠、邵汉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光明日报》1991年10月14日。

③ 《郭沫若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7页。

④ 邵汉明:《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新长征》1999年第4期。

⑤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9页。

⑥ 如刘晓波在其《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中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其他如《河殇》的作者谢选骏所著《传统文化已经终结》(《电视月刊》1988年第10期)等。

秀因子的再次厘定,^①这种极端的声音只能说是突然面对西方强势而愤慨于国家精神文化疲惫的非理性之词。它从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强烈震惊,由此产生自身焦虑的深刻程度。在此一点,它确乎与“五四”时国门突然洞开从而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的无比震惊和焦虑有些相似,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必然会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评价、去反思传统文化。另一种是自我认同的焦虑。“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寻求的人生意义,他们情感的和信仰的诉求,毕竟要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间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如重视人伦日用,讲究合乎情理,主张不偏不倚,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等。”^②改革开放又一次使国门大开,强势的西方文化潮涌而入,中国文化必然需要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与位置,这种对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是平等的,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认同的焦虑。“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没有自我身份意识,或者说人只有明确肯定地知道自己是谁,才有可能解脱束缚。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他就连自己缺乏什么都不知道,认为自己完满充实的主体不会有需要造反的感觉。因此,受压迫民族的‘否定性’——意识到自己的虚脱状况——蕴含着一种更加积极的存在样式。异化的真正胜利在于人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异化了。”^③只有民族文化传统才能解决我是谁、我应该怎样的自我认同问题。而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对社会、对伦理道德、对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人为中心的启蒙理性在重现人的价值、尊严之时,也使人的精神信仰产生了危机,追求物质的享受给人带来舒适的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拜金主义使社会道德堕落,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欲望都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不能不问,构建我们精神、情感、心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该何去何从。

反观无论否定贬抑抑或辩证的肯定传统文化的评论者,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来没有站在纯粹学术的角度上,而是源于强烈的现实的紧迫感,源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对思想文化的现实需要,是对

① 严家炎先生的《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一文即对有些学者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五四”固然有偏激之处,但更主要的,“五四”对于传统文化是革新,而非抛弃,它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的危机,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8页)。

② 张曙光:《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民族主义:反讽和关怀》,《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当今时代历史发问的回应,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能够摆脱几千年思想的重负从而轻装上阵、奋起直追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楷模,传统文化中哪些精神价值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动力,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而新的话语范型尚未建立,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大转型期应该处在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都在力图去解决这些时代的疑问,彰显出一种强烈的入世情怀、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入世情怀、忧患意识不正是儒家文化传统对人类精神思想的遗留,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与行为原型——“原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新述”?^①哪怕是如刘晓波那种极端的虚无与愤慨?诚如郑敏所说:“其实近年关于文化传统的讨论,据我所知,其动力还真是来自世纪末自我审视,是纯本土的,出于回顾与展望,形成中国当前文化的前因后果,而产生的焦点谈论。”^②

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无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③在这个传统的洪流中,我们祖先集几千年生命智慧创造的儒家文化传统无疑是其中的根本流脉,它不断地吸纳新质,创造新生,构建着我们灵魂和精神的家园。

第二节 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

一 儒家文化传统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影响

——从作家和读者方面来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乃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运动始终的大问

① 王一川在《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艺》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原忧”之中。这种“原忧”是“原债感”和“原任感”两种情结剧烈冲突的产物。“原债感”来源于个人与“家”“国”的伦理关系,它要求人孝父忠君,是遵循传统的,“原任感”来自于“天道”所赋予承担的神圣使命,是孟子所谓“天降”之“大任”。“原债感”和“原任感”并不总是和谐的,相反,在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如“转折”或“动乱”年代),“原任感”往往是反传统的革命的,与“原债感”发生冲突。但另一方面,二者也可能有某些潜在的相通之处:反传统论者在潜意识中也对传统寄以深深的眷恋之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103页)。

② 郑敏:《文化、政治、语言三者关系之我见》,《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

题”^①，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新时期时代文化的中心问题。文学创作正是时代文化建设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是贯穿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潜在主题和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与现代）造成人的观念转变，对人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文学要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那么，作家不管有意或无意都必然会在创作中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反思、改革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女性主义的小说，具魔幻、荒诞、先锋色彩的小说等几乎都留下了作家对这一时代问题回应的痕迹。在这一过程中，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造就的作家自我身份的想象，造就的作家、读者的文学想象和期待，并不会随着现代文化的到来而突然改变。

（一）儒家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

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是由古代的“士”演变而来的，如杜维明认为，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作为士大夫，他们确定其政治角色，并通过官僚制来履行其社会功能。他们是导师；他们是伦理的模范；他们是博学的学者；他们是智者；他们是精神的领袖；他们是社群的领导。究极而言，他们信守的对象是人类境况改善而非此世的实在。这一点使得他们承担了一种可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具有良知的宗教领导人对政治事务没有深入的关怀，对社会服务没有积极的参与，对文化事业没有深厚的敏感，这是无法想象的。”^②当代作家也承载了诸多传统的“士”在历史推进中形成的精神传统。

这种精神传统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忧患意识”。徐复观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化，乃“一忧患之文化也”。^③儒家文化传统中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名训，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传诵。何为“忧患意识”？徐复观先生认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④。夏乃儒先生依此进一步指出，忧患意识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理智与情感的融通，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是觉醒与未悟的

①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489页。

② [美]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③ 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见徐复观著，陈史艰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④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桷凿;简言之,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的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①传统的“士”作为掌握文化的一个阶层,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主要承担者。这种忧患意识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加入更为合理更具时代特色的因素,从孔子的“忧道”、孟子的“忧民”“忧天下”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孙中山的“四万万”人民的“亡国亡种”之忧,几千年来,忧国、忧民、忧世、忧天下,是无数志士仁人的精神血脉。也可以说,正是缘于儒家文化传统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造就了儒家“士人”的积极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为士大夫阶层制定的人生理想,张载《西铭》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历代传统士大夫自觉身负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感怀诗、咏史诗之类的创作极多,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作,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即使是如白居易的闲适诗,李白充满狂放恣肆的夸张与想象的诗篇,底色里也是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治国、平天下”志向无法实现的寂寥与忧愤。中国重视历史,史传传统的发达,也未尝不是因为历史可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具有“垂训鉴戒”的作用。这种忧患意识产生的强烈干预改造社会的意识表现在现代作家身上,就是以文学负载思想启蒙、革命动员的重任。鲁迅的以文学“疗救人们精神的创伤”冲出“铁屋中的呐喊”,钱钟书说自己的创作是“忧世伤生”之作,就是忧患意识的一种表征。对“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不论各家对于“道”做出何种解释,在现代新儒家钱穆先生看来,“中国文学家亲附人生,妙会实事,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能向心而上行。文以载道,正为此发”。^③文以载道,并不是求道弃世,而是执道入世。所谓道,就是人生,道是人生不可须臾扬弃的圭臬。

新时期作家继承了这种忧患意识。蒋子龙说他的《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④这无疑说尽了新时期伊始作家们以文而执道入世的实践行为。《将军吟》对“文革”中坚守信仰的将军的赞颂,《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对历次政治运

① 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李世民语。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魏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1页。

③ 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页。

④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见彭华生等编选:《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动的反思,《沉重的翅膀》谱写着“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的一代赞歌,他们对当下社会最迫切问题的敏锐反应,对人民代言人、启蒙者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认同,已经昭示了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陈忠实“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①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对民族命运关注的创作冲动,刘玉民的“响应时代的召唤”^②,张平的“义无反顾、大张旗鼓的张扬正义和勇敢本色,大力支持我们国家领导阶层中的健康力量和改革力量”,^③贾平凹以为故乡“立碑”而创作《秦腔》,刘醒龙秉持着“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与灵魂”^④的创作理念,张炜“让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⑤虽然对生活中的苦难充满了忧虑和牵挂,但力图让自己的作品带给人温暖和希望之光。这些并非作家的堂皇、媚俗之辞,而是他们投身写作时真实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必然促使作家创作出严肃的文学作品。历史小说不可能不继承我们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传统影响着历代历史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如熊召政所说:“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⑥历史小说的创作是源于作家对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现状深怀感触,在创作中渗透了作家对当下生活的认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了四部获奖作品: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除《暗算》之外的三部都触及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民族传统的逐渐瓦解消逝,现代化过程中道德的沦落,或者如詹石磴的把持,旷开田的沉沦,暖暖的坚守(《湖光山色》),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给我们现代化这一伟大进程的不同面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表明

①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② 杨景贤:《作家要响应时代的召唤——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玉民》,《走向世界》1998年第1期。

③ 张平、俞凡:《没有义愤就没有激情——作家张平访谈录》,《出版广角》1999年第11期。

④ 《刘醒龙曾被人嘲笑“坐家”:我不是写作天赋高的人》,2011年11月29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1/2011-11-29/107896.html>。

⑤ 《文学需要在生命中感悟——访著名作家张炜》,2011年12月7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2-07/108787.html>。

⑥ 熊召政:《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